

“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 “参与式社会主义”

——读托马斯·皮凯蒂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

文_崔之元★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继 2013 年出版《21 世纪资本论》之后，又于 2020 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 2019 年出版）。此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前现代世界各国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会，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的转变；第二部分讨论西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遗产，包括英国解放加勒比海奴隶时为赎买奴隶主的奴隶财产权而发行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第三部分讨论所有权社会在 20 世纪前 70 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的局部改进，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即 21 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本文仅就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进行评价。

“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 C.Lakner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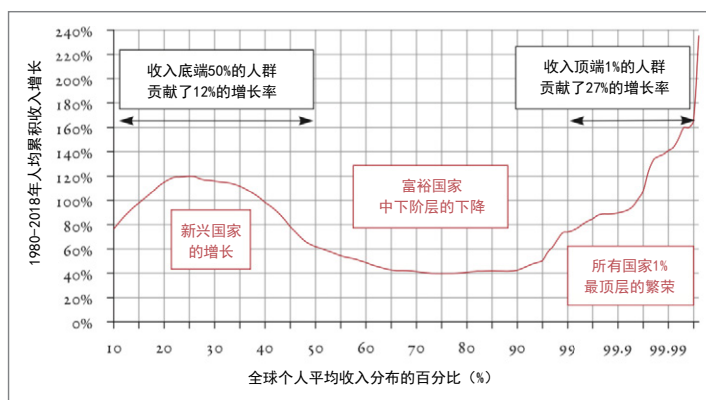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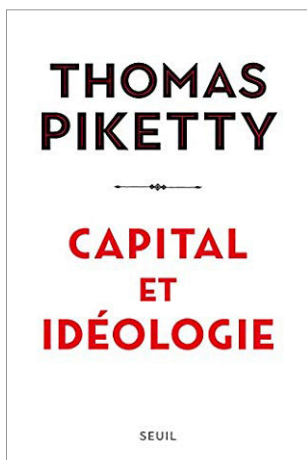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获益不平等的“大象曲线” (1980-2018)

数据来源：piketty.pse.ens.fr/ideology

B.Milanovic 两位学者于 2015 年提出。皮凯蒂根据他和全球 100 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 80 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该曲线如图 1。

此图表明，在 1980 到 2018 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 50% 的人群的购买力有 60%-120% 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 1% 的人群的购买力有 80%-240% 的增加，而收入中端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两端人群的增加值。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 1% 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下端 50% 人群的收入增长。这一曲线比较符合

★ 崔之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资本与意识形态》法文版

我们的直觉，即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得多得多（1% 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 50% 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收入则增加较少甚至下降。皮凯蒂进一步给出了 2018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

2018 年，10% 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 34%，中国是 41%，俄罗斯是 46%，美国是 48%，撒哈拉非洲是 54%，印度是 55%，巴西是 56%，中东是 64%。

“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况的描述，而全球财产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表示的最低 50% 人群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凯蒂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 1780-2015 年间的演变情况：

这一段时期，瑞典最富有的 10% 人群拥有总财产的 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最富有的 10% 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 50%，受益者处于财产分布在 50% 到 90% 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 50% 的人拥有财产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或者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

到嘴”，储蓄增长很慢，离他们能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婆罗门左派”

综合全球收入分布和全球财产分布的情况，人们会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最低端的 50% 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这就涉及皮凯蒂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凯蒂用此概念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80 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 1950-1980 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他提供了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在 1950-1970 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当时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收入与财产也较少。但 1990 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成为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婆罗门左派”），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皮凯蒂发现，这种现象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例如，美国民主党 1948-2016 年的得票情况也是如此。

在 1948 年，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 10% 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 90% 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 21%；而 2016 年特朗普当选时，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 10% 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 90% 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 23%。换言之，在 1950-1980 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一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最高的人群。

皮凯蒂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 1980-2020 年间交替执政，使得收入、

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 50% 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 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本性造成的。皮凯蒂认为，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 1968 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美国南方大量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从民主党争取过来。皮凯蒂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况且在欧洲很多没有美国那样明显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也出现了，可见这种长期社会结构演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与公共教育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他认为，不是底层 50% 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代表了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 50% 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

皮凯蒂特别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参与式社会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凯蒂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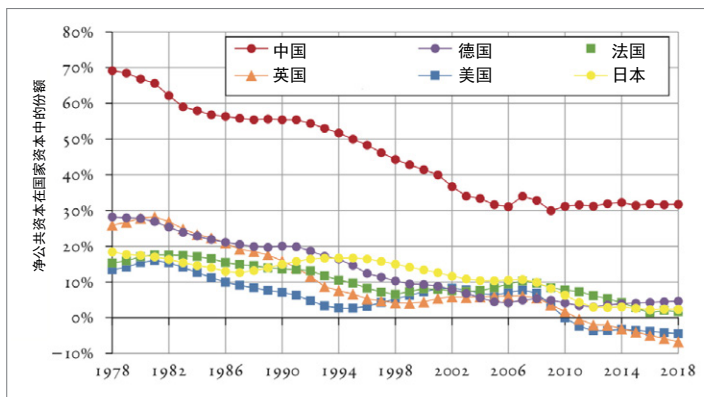


图 2 公共资产的下降 (1978-2018)

数据来源：piketty.pse.ens.fr/ideology

建立“混合经济”

皮凯蒂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实行“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 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如图 2 所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 15%-30% 左右，但从 80 年代开始就已经大规模私有化，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2013 年，西方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 2019 年，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值。图 2 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 1978 年的 70% 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 30% 左右。

皮凯蒂强调，净公有资产为零或为负，加上“新自由主义”给富人减税（例如，里根 1986 年把 1932-1985 年间对富人的联邦所得税率从 86% 降到 28%），导致西方国家主要靠发行公债来维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而欧盟发行公债又受到 1992 年欧盟成立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财政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的限制。2012 年，欧盟达成“预算条约”，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0.5%。这里的 3% 和 0.5%，都是指“二级赤字”，即给公债付息后的赤字。皮凯蒂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债等于该国 GDP 的 100%，利率是 4%，那么它就需要相当于 GDP 3.5% 的初级预

算盈余才能满足 2012 年预算条约的 0.5% 规则”。这将严重限制国家履行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的能力。例如，2018 年意大利无法承受 0.5% 规则，最终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达成妥协，同意意大利的赤字定在 GDP 的 2%，但这仍然需要意大利维持 0.5%-1% 的初级预算盈余，而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资增加两到三倍。这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互动的情况下，国资为负值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削弱的一个例证。

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在世界不少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和实验阶段。皮凯蒂提出“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则进一步提出需要“公民资本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他提供了全欧洲财产分布的演变：1900-1910 年间，欧洲最富有的 10% 人群拥有总财产的 80%-90%，而 2010-2020 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 50%-60%，这一“小改善”主要为财产分布位于 50%-90% 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 1900 年的 10% 上升到 2020 年的 30%-40%。而处于底层 50% 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 5%-10%。皮凯蒂认为，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 50% 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西方推崇的“机会平等”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 25 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凯蒂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 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 20 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 25 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 万欧元。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

皮凯蒂建议，“公民资本禀赋”的资金来源是累进年度财产税(占 GDP 的 4%)和累进遗产税(占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GDP 的 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来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 GDP 的 45%，其中 5% 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 用于“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 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发放额相应(按较低比例)减少。经过计算，皮凯蒂认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 30%，用当年 GDP 的 5% 即可以发放。至于税率，皮凯蒂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 10 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 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 100 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 80%-90%。

发展“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

皮凯蒂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关于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出现于 1945-1951 年间，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 1919 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有关经济民主化条款。受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 年 11 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败后的德国，重返家园的很多士兵生计无着，很多企业主逃跑，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不少企业。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存在 6 个月，但“经济民主化”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1951 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按照《煤钢共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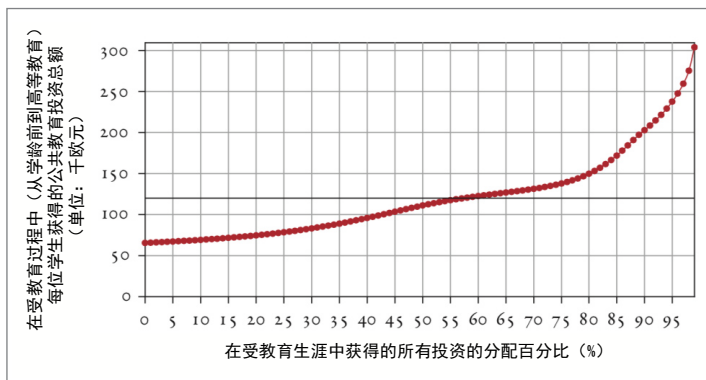


图3 法国教育投资的不平等 (2018年)

数据来源: piketty.pse.ens.fr/ideology

的规定,当企业工人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对等共决制,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工人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即: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如果出现各占50%的平局,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定。

皮凯蒂建议,“准对等共决制”应从两方面改进。第一是“公民资本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工作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超过企业总资本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职工参与企业发展方向性讨论的民主权利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较德国为弱的“劳资共决制”;英国工党首相Harold Wilson在1978年建立了研究“劳资共决制”的委员会。2016年,英国工党纲领中正式写入了一些学者起草的“12点劳动法宣言”,其中包括大企业董事会中,职工董事占20%和全部董事由股东和职工的“混合代表大会”产生。

为何法国和英国的“劳资共决制”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相对滞后?皮凯蒂认为,原因是从二战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一直把国有化作为主要纲领,而忽视了大企业内的经济民主问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放弃了“国有化”纲领,

重点发展“劳资共决制”。从皮凯蒂既注重“公私混合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括中国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尽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和“婆罗门化”,他在“经济民主”纲领上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会的公平化

皮凯蒂认为,西方左翼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有着密切关系。法国2018年时公共教育投资不平等如图3所示。

图3说明,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结束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针对上图所显示的法国公共教育投资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16岁就结束学校学习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离开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凯蒂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标准应该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凯蒂希望他提出的初步教育改革设想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公共讨论。

用公民“民主券”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皮凯蒂深知,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他的上述改革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券”(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

人政治献金。

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券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券，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支持自己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券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支出限额和不得在民主券之外获得个人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券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个人超过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图民主券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规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额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具体哪个党的总统候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是用公共资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重要进展。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严重漏洞。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很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超过35%的纳税人这样做；第二，尽管竞选支出限额是必要的，但美国规定的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费用不断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而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判决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这样，从2012年以来所有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世界各国建立选举公共资金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Julia Cage）教授在

《民主的价格》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实行“民主平等化券”的设想，这类似于19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公共资金，法国公民在年度报税单上有打钩的选项，但在打钩时明确将7欧元的民主平等化券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同时严格限制或禁止私人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皮凯蒂完全同意这个设想，认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券，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一定等4或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地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意见。

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凯蒂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上文提到，他主张利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产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凯蒂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2014年，一群国际记者发布了“卢森堡解密”（LuxLeaks），揭露卢森堡政府建立避税天堂的种种隐蔽做法，同一批记者两年后又发布了“巴拿马文件”。在1995-2013年间任卢森堡财政部长和首相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间担任欧盟最高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目前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欧盟的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决定，需要55%的成员国同意，且其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由于“一致同意”原则，欧盟各国共同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这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欧盟都



高收入人群与底层人群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未能发行共同债券可以明显看出。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很多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如果不建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发展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凯蒂等人发表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公约”（<http://tdem.eu/en/manifesto/>），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对公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公约”提出建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议员。“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重要的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产税和碳税，从而克服避税天堂对“参与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许可欧盟成员国的子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组成“三国公民代表大会”，征收三国范围内的四项“共同税收”，由此逐步过渡到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税收。“共同税收”的用途可有两种：一是将50%的“共同税收”返还给各成员国用于削减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是

将另50%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科研，教育，环保。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凯蒂认为，完全可以建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共同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

以上是对皮凯蒂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容概括，有的读者可能觉得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革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效率

的降低。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皮凯蒂说，他的改革设想的出发点类似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这个“差异原则”非常直接：不平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超越“在贫困中的平等”。皮凯蒂的定量研究则证明，一个世纪以来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没有变化，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凯蒂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和1930-1980年英美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①

（编辑 季节）